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张家口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研究

高玉娟，张慧珍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运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理论和方法，对代表康保地方特色的[ŋ][o][ʔ][ɤ，ai，an，au，ou]4 组语音变项的变异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地方语音变项的使用逐渐萎缩，正在向普通话标准音转变，其普通话变式使用率排序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ŋ]>[ʔ]>[ɤ，ai，an，au，ou]>[o]；各变项的变异程度受使用者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及性别的影响，向普通话变异的趋势在年轻人、脑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和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普通话的大力推行是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的强大社会动力，与其他方言接触、当地人的语言态度及语言情感也是影响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的重要外部因素。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H1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5)05－0057－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5.05.008

Study on Phonetic Variation of Kangbao Dialect in Zhangjiak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GAO Yujuan，ZHANG Huiz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anguage variation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Sociolinguistic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variation of four sets of phonetic variables representing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Kangbao dialect：[ŋ] [o] [ʔ] [ɤ，ai，an，au，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se local variants is gradually shrinking and shifting toward standar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The usage frequency of Mandarin variants，from highest to lowest，is as follows [ŋ] > [ʔ] >[ɤ，ai，an，au，ou]>[o]. The degree of variation is influenced by speakers' age，occupation，education level，and gender. The trend toward Mandarin variants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younger speakers，mental workers，those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and women.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is a powerful social driver of phonetic variation in Kangbao dialect；The contact with other dialects，local language attitudes，and affective attachment to language are also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such variation.

Key Words：Sociolinguistics；Kangbao dialect；phonetic variation；social factors

收稿日期：2024－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YY005)

作者简介：高玉娟(1965－)，女，山东青岛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
张慧珍(2000－)，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幅度流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普通话普及程度的提高，国内很多城市的语言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很多变异现象[1]。郭骏[2]、刘楚群和黄玲玲[3]、高玉娟和贺晓冉[4]认为，许多城市的方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居民方言能力也呈弱化趋势；曹志耘[5]和汪平[6]甚至认为，有些地方的方言已成濒危语言，需加以保护。同样，河北方言的生存环境也正逐渐恶化，这一点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7]。其中，张家口方言的变异现象尤其受到关注，如郭风岚[8]认为，张家口地区宣化方言蟹止摄来母字韵母的读音在空间和年龄层上均发生了变异，正向北京官话靠拢；王馨璐及赵彤[9]发现，张家口阳原三马坊乡方言存在系统的子尾和子变音，该地老、中、青三代均使用子尾[uə]，中年人还同时使用子变音，中年人的子变音属于单纯长音型，可以与子尾自由变读，并未经历拼合型子变音阶段。在声调的变异上，郑莉[10]发现，张家口地区南部阳原、怀安、蔚县等地方言的去声由中升调变为了曲折调；此外，由于张家口方言归属于晋语张呼片[11]，且入声是晋语最典型的特点，因此，楚艳芳[12]、忻丽丽[13]、王芳[14]对张家口不同地区的入声舒化现象作了研究，发现入声受方言的影响正逐渐减少，并向普通话靠拢。

位于张家口坝上西北角、紧邻内蒙古自治区东南缘和阴山穹折带的康保①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见证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也塑造了独特的人文特色。因此，该地方言融合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此外，作为历史悠久且相对封闭的语言，晋语因保留了众多古音痕迹而备受关注，但作为晋语的分支，康保方言受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其入声舒化现象上[13]。据初步考察，目前康保方言也发生了变化，表现出一些变异特点。那么，康保方言变异有哪些特点呢？是否也与其他一些方言一样在普通话的剧烈冲击下发生了萎缩？萎缩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本文拟在社会语言学视域下从语音变异视角探讨康保方言语音的变异情况，并从语言外部环境寻找引发变异的社会因素，考察社会因素和语音变异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康保方言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

二、康保方言的音系特点

本文所研究的康保方言，其范围限定在康保县内。康保方言属于晋语张呼片，虽具有张家口市区方言的许多特点，但又有自己的音系特点。本文借鉴张家口方言的相关研究成果[15]归纳康保方言与普通话音系的主要差异，具体如下。

(1)零声母字少于普通话。普通话中以[ɤ，ai，an，au，ou]开头的零声母字在康保方言发音中前加声母[ŋ]或[n]，如将“饿[ɤ]”发为“饿[ŋɤ]”。

(2)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混同。普通话中的舌尖后音[tʂ][tʂʰ][ʂ]在康保方言中发为舌尖前音[ts][tsʰ][s]，如将“知[tʂʅ]”发为“知[tsɿ]”。

(3)鼻音韵尾混同。部分中、老年人将一些舌面后鼻音[ŋ]发为舌尖中鼻音[n]，如将“星[ɕiŋ]”发为“星[ɕin]”；而青少年则与之相反，将舌尖中鼻音[n]发为舌面后鼻音[ŋ]，如将“拼[pʰiən]”发为“拼[pʰiəŋ]”。

(4)存在入声韵尾[ʔ]。康保方言保留着古入声的特点，其中入声韵母显著存在。康保方言有 6 个以喉塞音[ʔ]结尾的入声音：[aʔ][iaʔ][uaʔ][əʔ][iəʔ][yəʔ][16]，如将“辣[la]”发为“辣[ləʔ]”。

(5)缺少[o]韵母。康保方言韵母[o]与[p][pʰ][m][f]相拼时，往往将圆唇的[o]发为展唇的[ɤ]，如将“播[po]”发为“播[pɤ]”。

(6)声调有平、上、去、入 4 个调类，但与普

① “康保”一词即源自蒙古语“康巴诺尔(淖尔)”的谐音，意为美丽的湖泊。

通话调值不同,平声为[21]、上声为[55]、去声为[35]、入声为[2],上声调极少[17],平声和入声不分阴阳。

三、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的调查

(一)语音变项与语音变式

语音变项(variable)是指"一组表达相同语义的不同语音形式",不同表现形式就是组成该变项的不同变式(variant)[18]48-49。例如,在英式英语中,单词"bath"一些人发成[bæθ],而另一些人发成[bɑːθ],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社会因素所致,如不同社会群体存在发音差异。这两种发音形式就是单词"bath"这个语音变项的两个语音变式。

根据康保方言的音系特点,本文将下列 4 组最具地方特色的语音变项作为研究对象。

(1)[ŋ]变项。[ŋ]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 1,发普通话的舌面后鼻音[ŋ];变式 2,发康保方言的舌尖中鼻音[n]。

(2)[ʔ]变项。[ʔ]变项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 1,无喉塞音[ʔ]发音;变式 2,保留古入声的音,即以喉塞音[ʔ]为韵尾的音。

(3)[ɤ,ai,an,au,ou]变项(以下简称[ɤ]变项)。以[ɤ,ai,an,au,ou]开头的零声母字的两个变式分别为:变式 1,发零声母音;变式 2,零声母前加[n]或[ŋ]音。

(4)[o]变项。[o]变项的两个变式:变式 1,发普通话圆唇音[o];变式 2,发康保方言展唇音[ɤ]。

(二)调查对象及发音语料

为全面了解康保方言语音变异情况,本文以康保县人作为一个言语社群,采用分层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从不同年龄、职业、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选取被试 103 名,收集其发音样本。根据以下标准选择被试:被试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性别等社会因素尽量均衡;长期在康保县居住且年龄在 12 岁以上,平时说康保方言①;无耳鼻喉、口腔疾病及左脑损伤失语症。被试构成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被试构成情况

社会项	分组	样本数
年龄	12～19 岁	9
	20～29 岁	16
	30～39 岁	22
	40～49 岁	21
	50～59 岁	15
	60 岁及以上	20
职业	教师	12
	文员	17
	服务人员	18
	工人	14
	无业	17
	学生	2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5
	初中	31
	高中	14
	大学及以上	18
	在读学生	25
性别	男	46
	女	57

发音语料即调查所用的发音词表由含有上述 4 组语音变项的二字组或三字组词语组成,共计 37 个词语。考虑到这其中有被试不认识的字,故在词语选择上倾向于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调查时先由测试人员用康保方言与被试闲聊,营造出一种亲切、随和的康保方言会话语境。为了使发音误差最小化,鼓励被试在发音前充分熟悉发音词表,然后让他们用平时说话的方式以正常语速自然说出词表中的词,同时使用录音设备录音。对录音进行多次听辨并分析整理,最后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量化分析并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总体分析

从调查结果发现,对于上述 4 组地方音鲜明的语音变项,被试间发音差异很大,有些人几

① 判断被试是否说康保方言,关键在于其发音中是否将舌尖后音发成舌尖前音以及是否有入声出现,因为这是康保方言与其他方言最显著的区别。

乎完全保留了康保方言原有的发音习惯，而有些人则消除了地方发音。忽略各组变项的界限，将这 4 组变项作为一个整体来统计，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的大致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被试语音变异总体情况

普通话变式/个	发音人数	所占比例/%
0	0	0.0
1～5	1	1.0
6～10	4	3.9
11～15	6	5.8
16～20	17	16.5
21～25	14	13.6
26～30	25	24.3
31～35	33	32.0
36～37	3	2.9

由表 2 可知，对于康保方言这 4 组最具地方特色的语音变项，虽然被试发音中或多或少掺杂了普通话的语音成分，但向普通话转化的情况不尽一致。从分布来看，32.0%的被试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为 83.8%～94.6%，这是整体分布的主要集中区域，且普通话变式个数在 15 个以内的发音人数分布较少，仅占 10.7%，这表明数据的分散程度较大；从使用率来看，仅 2.9%的被试几乎将发音词表中所有的字均发成了普通话变式，无任何被试完全保留地方音变式，且 81.5%的被试普通话变式使用率高于地方音变式使用率。

（二）分项分析

1.[ŋ]变项

在发音词表中设计了 10 个含有[ŋ]尾字的词语，分别是“有用、听见、月饼、瓶子、明天、行不、钉子、另外、北京、拧开”，以考察康保人将普通话中舌面后音[ŋ]发成舌尖中音[n]的情况。103 名被试的发音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ŋ]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数量统计

普通话变式/个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音人数	2	2	1	1	1	1	1	6	5	3	80
所占比例/%	1.9	1.9	1.0	1.0	1.0	1.0	1.0	5.8	4.9	2.9	77.6

表 3 显示，对于[ŋ]变项的发音，高达 77.6%的被试完全发成普通话变式，即绝大部分被试将[ŋ]读成普通话发音变式，而仅 1.9%的被试完全将[ŋ]读成地方音变式[n]，另有 20.5%的被试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地方音变式。可见，康保方言中[ŋ]变项向普通话变式转化的程度很高，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预计短时间内会消除地方式发音。

2.[ʔ]变项

在发音词表中设计了 9 个词语，分别为“张北、七百、吃药、辣的、脖子、获得、这个、那个、可好看”，以考察康保人入声音节的发音情况。103 名被试的发音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ʔ]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数量统计

普通话变式/个	0	1	2	3	4	5	6	7	8	9
发音人数	0	0	1	5	16	14	27	18	19	3
所占比例/%	0.0	0.0	1.0	4.9	15.5	13.6	26.2	17.5	18.4	2.9

由表 4 可知，有 2.9%的被试将该变项完全发成普通话变式，没有任何被试将其完全发成地方音变式。78.6%的被试普通话变式个数高于地方音变式(即普通话变式个数>4)，仅有个别被试仍然保留入声。这说明两种变式尚处于活跃的“共存”状态，虽然地方音变式向普通话标准音接近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是个别根深蒂固的入声字发音完全过渡为普通话发音仍需要一段时间。

3.[ɤ]变项

在发音词表中设计了 10 个词语，分别是“天鹅、饿了、挨打、爱好、安全、案子、按道理、熬汤、棉袄、藕粉”，以考察康保人在对该组零声母字发音时前加[n]或[ŋ]的情况。103 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ɤ]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数量统计

普通话变式/个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音人数	6	4	8	7	4	5	8	14	17	15	15
所占比例/%	5.8	3.8	7.8	6.8	3.8	4.9	7.8	13.6	16.5	14.6	14.6

表 5 显示，对于以[ɤ，ai，an，au，ou]开头的零声母字发音，虽有 14.6%的被试完全消除了康保发音变式，即在发这些韵母时前面不再加[n]或[ŋ]，但仍有 5.8%的被试将全部 10 个词语完全发成康保地方音变式。另外，67.1%的被试该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使用频率超过了 50.0%，说明该组变项向普通话演变的程度不算太高，其地方音变式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但是，由于音节前不加[n]或[ŋ]更符合“发音省力”原则，加之普通话的推广、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语言接触的广泛，该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范围会不断扩大，使用率会更高，而康保地方音变式则会逐渐萎缩。

4.[o]变项

在发音表中设计了 8 个词语，分别是“上坡、沉默、广播、我们、模型、玻璃、渤海、破坏”，以考察康保人在[p][pʰ][m][f]与韵母[o]相拼时将圆唇的[o]发成展唇的[ɤ]的情况。103 名被试具体发音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6　[o]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数量统计

普通话变式/个	0	1	2	3	4	5	6	7	8
发音人数	10	6	12	7	6	17	14	11	20
所占比例/%	9.7	5.8	11.7	6.8	5.8	16.5	13.6	10.7	19.4

表 6 显示，虽有 19.4%的被试将该变项完全发为普通话变式，即将[o]全部读成普通话变式，但多数被试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康保地方音变式，其中 9.7%的被试全部保留了地方音变式，且保留地方音变式较多的群体占 34.0%（即地方音变式个数>4）。可见，该变项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向普通话演变的趋势，但康保地方音变式仍较强势，较难在短期内消除。

综合上述分析，各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率排序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ŋ]>[ʔ]>[ɤ]>[o]。

（三）社会因素分析

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认为，变异是语言不可或缺的成分，是语言的本质。没有变异，语言就会丧失交际功能。更重要的是，社会语言学家发现变异的发生、范围、频率和演变的方向等跟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因素有密切联系。一旦把看似杂乱无章的变异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社会因素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职业等联系起来，就会看出这些语言变异在人群中的趋向性[19]。因此，可以通过对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变量的调查和分析来揭示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本文基于 103 名被试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社会因素来考察康保方言语音变项的变异情况。

1.年龄因素

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认为，年龄是影响语音变异的重要因素，语言变化过程可以通过观察同一时期不同年龄的人的表现得以了解[20]。一般而言，老年人的言语容易保留一些旧的语言特征，而年轻人对社会的变化反应较快，其言语也较易发生变异，也更能代表语言变化的潮流和方向[21]。为考察不同年龄段康保人的语音变异情况，本文分别统计了各年龄组各变项普通话变式（V1）①的使用率，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7。

表 7 显示，从各年龄组语音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平均值来看，大致按照年龄由大到小呈上升趋势。其中，20～29 岁年龄组最高，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在该年龄段通常处在大学或研究生阶段，在学术和社交环境中被更多强

① V1 代表该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下同。

调使用标准和规范的语言，而且职业启动的经历、社交活动的增加会促使他们更加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和规范性；12～19 岁年龄组次之，这是因为一些年龄小的发音人遇到某些不熟悉的词汇，无法在当地语言中找到合适的发音，故采用普通话发音，这表明他们受普通话发音影响语码转换失败，这种音变方式不同于其他年龄段。此外，康保县属于欠发达地区，当地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够理想，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去市里完成学业，孩子只在寒暑假时才能返乡，因此受普通话及市区方言影响，这些孩子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较高。

表 7　各年龄组 V1 的使用率 %

年龄	变项				
	[ŋ]V1	[ɤ]V1	[ʔ]V1	[o]V1	平均值
12～19 岁	100.0	91.1	85.2	94.4	92.7
20～29 岁	100.0	91.9	85.4	93.8	92.8
30～39 岁	97.7	76.8	74.2	71.6	80.1
40～49 岁	90.5	70.5	63.5	61.9	71.6
50～59 岁	92.0	36.0	51.9	27.5	51.9
60 岁及以上	69.0	24.5	49.4	18.8	40.4

对于各变项的普通话使用率，60 岁及以上年龄组最低；30～59 岁年龄组中，4 组变项随年龄的降低而稳步升高，其中，[o]和[ɤ]变项的变化幅度较为明显，[ʔ]变项变化幅度相对平稳，[ŋ]变项总体呈上升趋势；12～19 岁和 20～29 岁年龄组均达到 85.0%以上。因此，在康保方言中 4 组变项的发音变异呈显著的代际差异，且随年龄降低渐向普通话靠拢。

2. 职业因素

职业在语言变异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以往调查研究的经验可知，区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二者间的语言差异较明显，脑力劳动者的语言往往比体力劳动者更接近标准语[22]。为考察康保县不同职业者的语音变异情况，本文将 103 名被试去除学生组(25 人)，分别统计其余各职业组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统计结果见表 8。

表 8　各职业组 V1 的使用率 %

职业	变项				
	[ŋ]V1	[ɤ]V1	[ʔ]V1	[o]V1	平均值
教师	88.3	81.7	72.2	72.9	78.8
文员	97.6	65.3	72.5	69.1	76.1
服务人员	94.4	62.8	58.0	55.6	67.7
工人	92.1	41.4	53.2	17.9	51.2
无业人员	64.7	23.5	49.7	21.3	39.8

表 8 显示，从总体上看，被试的职业不同，其康保方言这 4 个特色语音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也不同。其中，教师最高，为 78.8%；文员次之，为 76.1%，这两类人群均属脑力劳动者，在工作场景中有语言规范方面的需求，因此更倾向于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变式。再次是服务人员，为 67.7%，其较高是缘于近年来康保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国家牧场景区、卧龙图景区等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使得当地服务人员与外来人员接触的机会和频率大大增加，且为了方便与外地人交流，普通话使用频率也会增加，在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语音变异。

因此，在康保方言中 4 组变项的发音变异受职业影响显著，且存在明显差异。

3. 受教育程度

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认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语音变异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有威望的标准语的概率就越高，其语音变异程度就越高。为考察受教育程度对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的

影响情况，本文按照被试的受教育程度分组，分别统计各受教育程度组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情况，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各受教育程度组 V1 的使用率　%

受教育程度	变项				
	[ŋ]V1	[ɣ]V1	[ʔ]V1	[o]V1	平均值
小学及以下	74.7	25.3	48.9	21.7	42.7
初中	87.1	48.1	54.8	36.7	56.7
高中	98.6	73.6	73.0	67.9	78.3
大学及以上	89.4	72.2	71.0	69.4	75.5
在读学生	100.0	91.6	85.3	94.0	92.7

表 9 显示，总体上看，被试受教育程度不同，康保方言中这 4 个特色语音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也不同。整体趋势是，各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小学及以下水平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平均值最低，为 42.7%，而在读学生组最高，为 92.7%，存在显著差异，这恰好验证了学生是“向普通话演变的先锋队”[23]这一论断。

因此，在康保方言中 4 组变项的发音变异受教育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且差异明显。

4. 性别因素

在语言变异的定量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的言语往往比男性更接近社会上威望较高的语言形式。一个地区越是落后、闭塞和不发达，语言的性别差异越大；反之则相反[18]155。为考察康保当地男性和女性在普通话变式和地方音变式的使用上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 103 名被试分为两组，分别统计各性别组对各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情况，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10。

表 10　各性别组 V1 的使用率　%

性别	变项				
	[ŋ]V1	[ɣ]V1	[ʔ]V1	[o]V1	平均值
男	85.0	51.7	64.0	33.2	58.5
女	94.7	72.1	68.8	65.4	75.3

表 10 显示，总体来看，康保当地女性的 4 个特色语音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率平均值高于男性，前者为 75.3%，后者为 58.5%，差异明显。ANOVA 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性别组中[ŋ][ɣ][o]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检测水平均小于 0.05，说明男女在该三个变项普通话变式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向普通话转变的趋势较为明显；而[ʔ]变项普通话变式使用率的检验水平（$p=0.073$）大于 0.05，无显著差异。以上分析表明，[ŋ][ɣ][o]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在性别上差异显著，这一结果恰好支持了张妍[24]研究中关于性别类型对语音发音产生影响的观点。张妍通过声学实验和统计分析，从语音格局角度入手，考察了性别类型对普通话双字组声调音高、音长和音强的影响，结果显示，女性发音人双字组声调语音韵律特征不同于男性。[ʔ]变项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虽尚未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从直观数据仍可看出该变项女性高于男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在语言敏感性方面更为突出，她们更容易注意语音的细节和差异，从而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变式。

五、引起语音变异的外部因素

语言变异理论认为，任何语言变异都会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25]。虽然内部因素如语音系统内在结构可能对语音变异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通常来说外部因素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康保方言的语音变异主要是受到了语言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

（一）普通话的驱动

1955 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并大力

倡导在全国推广普通话[26]。经历数代人的更迭，方言逐渐向普通话靠拢；与此同时，主流社会对语言的期望、大众传媒以及基础教育中的单一语言要求（普通话），加速了方言语音的演变进程，导致方言的使用和传承环境逐渐恶化，也使得普方语言接触呈现出“无界”性，足以对方言语音形式造成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康保方言难以稳定地维持自身状态，趋向于普通话。从长远来看，普通话对康保方言的影响将逐步加大，然而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曲折漫长的。

（二）与其他方言接触的影响

康保县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虽地处京津冀都市经济圈，但地区相对封闭、经济发展滞后，致使大量当地居民选择进城务工，主要流向京津地区乃至南方地区。这些务工人员返乡时，会把在外形成的语音变化带回家乡。与此同时，发达地区的方言凭借自身强劲的向心力和外展力，往往会对弱势方言产生深刻影响。由此，多种方言不断交汇碰撞，使得康保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催生出很多变异现象。此外，受制于经济欠发达的现状，该地区文化自信不足，本地方言未能得到适当保护，来自其他方言的影响使得康保方言弱势地位更加凸显[13]，很有可能会成为被同化的一方。

（三）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虽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对某种语言的态度直接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最终影响语言的发展方向[27]。相关研究认为，由于受到语言态度的制约，人们在交流时会更加注意选择威望高的普通话变式，从而使得方言发音向普通话方向演变[1]。康保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方言常被视为落后、贫困的标志，因此，部分康保人对方言的个别读音存在排斥心理，而这种心理必然会对康保方言语音产生影响，比如造成的康保方言中的入声舒化现象；相比之下，保留入声较为完整的地区，如广东、福建一带，因其经济发达，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心强，自然会选择方言。

（四）语言情感的影响

语言情感是指说话人或听话人在说到或听到某种语言时在情绪、感情上的感受和反应，包括好听程度和亲切程度等[28]。通过对康保人的语言情感调查发现，长期居住在康保的中、老年人对方言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而年轻学生却相对较淡，他们在家乡时倾向于使用方言，而在外地时则会选择普通话作为沟通工具，这种家乡话和普通话交替使用的方式也会使语音变异在不经意中产生。

六、结语

经济发展和社会巨变带来了方言的变异，总趋势是方言逐渐萎缩，转而向普通话靠拢。这种变异凸显了社会因素的影响，即康保方言中 4 组特色变项的语音变异与康保人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密切相关。这些变异并非源自语言系统内部，而是受到外部力量的推动，其中普及普通话是主要因素，另外与其他方言接触、语言态度及语言情感也是影响康保方言语音变异的重要因素。

语言作为人们的交流工具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每种方言都有其独特价值，因此我们应树立正确的语言观、方言观，在普及和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应增强地域文化自信，以确保方言的独特性。

参考文献：

[1] 高玉娟. 大连方言阴平调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5)：86－93.

[2] 郭骏. 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几点思考[J]. 语言文字应用，2013(4)：30－39.

[3] 刘楚群，黄玲玲. 赣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2016(1)：120－129.

[4] 高玉娟，贺晓冉. 大连市区居民方言和普通话习得与使用现状调查[J]. 南开语言学刊，2020(2)：154－165.

[5] 曹志耘.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8－12.

[6] 汪平. 正确处理方言与普通话关系刍议[C]//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全国汉语方言学

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苏州：苏州大学文学院，2003：7.
[7] 李亚宏，李燕凌. 文化自信视域下河北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播[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2)：33 - 39.
[8] 郭风岚. 河北宣化方言蟹止摄来母字韵母的读音分布[J]. 语文研究，2007(3)：45 - 47.
[9] 王馨璐，赵彤. 晋语河北阳原县三马坊乡方言的子尾与子变音[J]. 语文研究，2023(3)：7 - 14.
[10] 郑莉. 现代河北方言声调的演变[J]. 语文研究，2014(1)：56 - 60.
[11] 沈明. 晋语的分区(稿)[J]. 方言，2006(4)：343 - 356.
[12] 楚艳芳. 河北阳原西城方言语音记略[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4)：42 - 45.
[13] 忻丽丽. 晋语张呼片康保方言入声舒化的社会原因初探[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6)：36 - 39.
[14] 王芳. 张家口市方言的入声音变[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2)：47 - 52.
[15] 马玉佩. 张家口方言研究综述[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4(2)：15 - 17.
[16] 刘淑学. 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49.
[17] 河北省康保县志编纂委员会. 康保县志[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977.
[18] 陈松岑. 语言变异研究[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19] 陈忠敏. 音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J]. 民族语文，2008(1)：19 - 32.
[20]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21 - 123.
[21] 李伟.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2.
[22] 高玉娟，包天虹.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庄河方言语音变异研究[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5)：117 - 124.
[23] 曹志耘. 济南方言若干声母的分布和演变：济南方言定量研究之一[J]. 语言研究，1991(2)：36 - 44.
[24] 张妍. 普通话双字组声调语音韵律特征分析[J]. 唐山学院学报，2020，33(5)：44 - 50.
[25] 高玉娟，邵钟萱. 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沈阳方言语音变异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5)：128 - 134.
[26]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0.
[27] 高玉娟，关亦容. 辽东半岛庄河市区居民语言态度调查分析[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3)：120 - 130.
[28] 陈松岑. 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1)：81 - 95.

(责任编校：冯兆娜)